

中华文明  
起源与形成  
系列④

高江涛 邱楠 赵海涛 分别论述黄河沿线的陶寺、石峁、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复杂化变迁

# 约4000年前，中国的古国向王国迈进

## 高江涛：陶寺，“最初中国”从此走来并成长

陶寺是距今4300年前晋南之地文明演化的一座都邑，它是文献中记载的中华尧都，还有可能是我们说的“最初中国”，而最初中国所创造出来的文明传承至今。

### 文明蕴化：地理上有先天优势

陶寺遗址位于临汾盆地偏中间的位置，恰好处于汾河与塔儿山之间，属于典型的依山傍水。地势最低的汾河较暗，塔儿山较亮，是阴阳交汇之地，是典型的适宜居住地带。

陶寺所处的小区域一则是明显的微型“生态交错带”。处在相对平坦的大缓坡黄土台源地带，排水比较通畅，地域延展性很强，土壤干湿度较为适中，肥沃度也较为适宜。二是“相对封闭性”的环境。国外“限制性”理论认为，早期国家最有可能在自然环境相对封闭的区域产生，如果土地肥沃、水文适宜，农业经济会迅速发展，财富会迅速积累。为了保护这些经济和财富，各种政治权力机构和分配财富密切相关的等级制度随之产生。文明最核心的权力机构、政治组织机构成熟和复杂，直到国家出现，文明就会形成。由此看，陶寺所在区域是一个文明易生之地。

《管子·乘马》开篇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而陶寺恰好符合这样的特点。

### 煌煌都邑：衣食住行生产劳作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诞生了一个煌煌都邑。

从筑城造郭上看，陶寺修建了巨大的城墙，城墙内既有核心区官城，又有外部的大城郭，形成了后来都城制度常见的双城制。它还蕴含着明确的规划布局理念。城的东北部是核心区官城所在，官城近处是仓储区，东南部是墓地，西南部是手工业区，西北部是普通居民区。《周易·系辞上》中记载：“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这个“方”是指不同的划分，官城区即是“人方”。

在建宫立室上，现在13万平方米的官城内，勘探到面积达到1000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有十余处。其中1号宫殿基址发掘面积约为6500平方米，将近1/4的基址都被破坏了，地面与地面之间的落差甚至能达到1.8米。3/4的保留中至少有一座主殿和三个附属的房屋，主殿残留了三排18个柱子，柱子直径在50厘米左右，下面是柱础石。可以说该主殿是两个进深，面阔七间，仅主殿的面积就能达到540平方米，可见其宏伟程度。推测后面还有一座像它一样的主殿，因为后方还保留着三个柱洞。

1959年，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调查“夏墟”时发现了二里头都邑。据最新测年，二里头文化存在于公元前1750到1520年。64年的考古工作得出两个共识：一是确立了二里头在中华文明时空坐标中的重要位置，二是确立了它在中国王朝国家形成和夏文化研究上的核心地位。

### “井”形布局，体现统治模式

二里头文明创下了诸多中国之最。二里头中心区的四条道路形成了“井”字型的框架，道路宽10-20米，在南边东西向道路上发现了或是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车辙，可推测当时车极少，唯最高级贵族才可使用，因此车可能是种礼器。

最重要的三个功能区在都城的中路，官殿区位居中心，作坊区和祭祀区分列南北。中路的东两侧分别是贵族的居住和埋葬区。这些重要的功能区都围绕着官殿区分布。官殿区西南是面积近11万平方米的官城，是最高级的贵族居住区域。这些布局体现了当时社会结构划分严格，统治井然有序，已具备发达的统治制度和统治模式，也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官殿区(后期成为官城)是大中型官室建筑集中分布区，是政治和宗教权力的核心

2022年有个新发现，1号宫殿基址西侧的边缘发现了一个始建时的祭祀坑，是首次发现的与官殿有关的祭祀坑。它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埋的是猪骨与狗头骨，还有烧烤过的陶器；下层则是三人人骨，包括两个成年人和一个没有头的儿童。在基址南边发现了一个“井”，井底反而扩大了，推测或许是用于藏冰纳冰的“凌阴井”。

在陶寺城里发现了四千多年前的“观象台”。城内还发现了聚族而居的早期墓地共1309座，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陶寺还发现了数量较多、种类不同的7件铜器，其铸造技术就是夏商周三代常见的核心技术——复合范铸技术。

此外，2015年，陶寺浮选出来了水稻、大豆等，该地饲养以猪为主，也发现了绵羊、黄牛、水牛、竹鼠等品种。

### 中华尧都：实证印证旁证佐证

主流观点认为陶寺是文献记载中的尧都。需要强调的是，尧舜禹为代表的那个“时代”是真实存在的。至于不同的遗址具体是谁的都城，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就陶寺是尧都有四方面论证。

第一，有考古实证。上面已详细阐释。

第二，有文献印证。比如《尚书·尧典》《尚书·论语》《史记》《周易》《帛书》《竹书纪年》等等。

第三，有民俗旁证。比如，陶寺百姓把太阳叫“穹窿”，当地人发音就是“尧王”。又如，洪洞“接姑姑，迎娘娘”的走亲习俗传承至今，“姑姑”“娘娘”就和尧的二女密切相关。霍州清明祭祖用“蛇盘盘”的花馍祭祖，它与陶寺的龙盘盘竟然有些相似。在临汾特别流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威风锣鼓”，而在陶寺发现了大量的鼙鼓、土鼓等鼓乐。

第四，有文化遗产的佐证。临汾有尧庙、尧陵、尧居，还有传说是尧洞房的仙洞沟。

陶寺还应该是“最初的中国”。中国的本意是“地中”，陶寺发现了与观象有关的疑似“圭表”，换算成陶寺尺为是1.6尺，恰恰是《周髀算经》中提到的夏至影长，就是“地中”所在的夏至影长。从发展历程来说，从距今6000年的庙底沟文化时期开始是从文化母体中孕育“中国”；到陶寺文化时期，诞生了“中国”；而至二里头时期已是相对成长起来的“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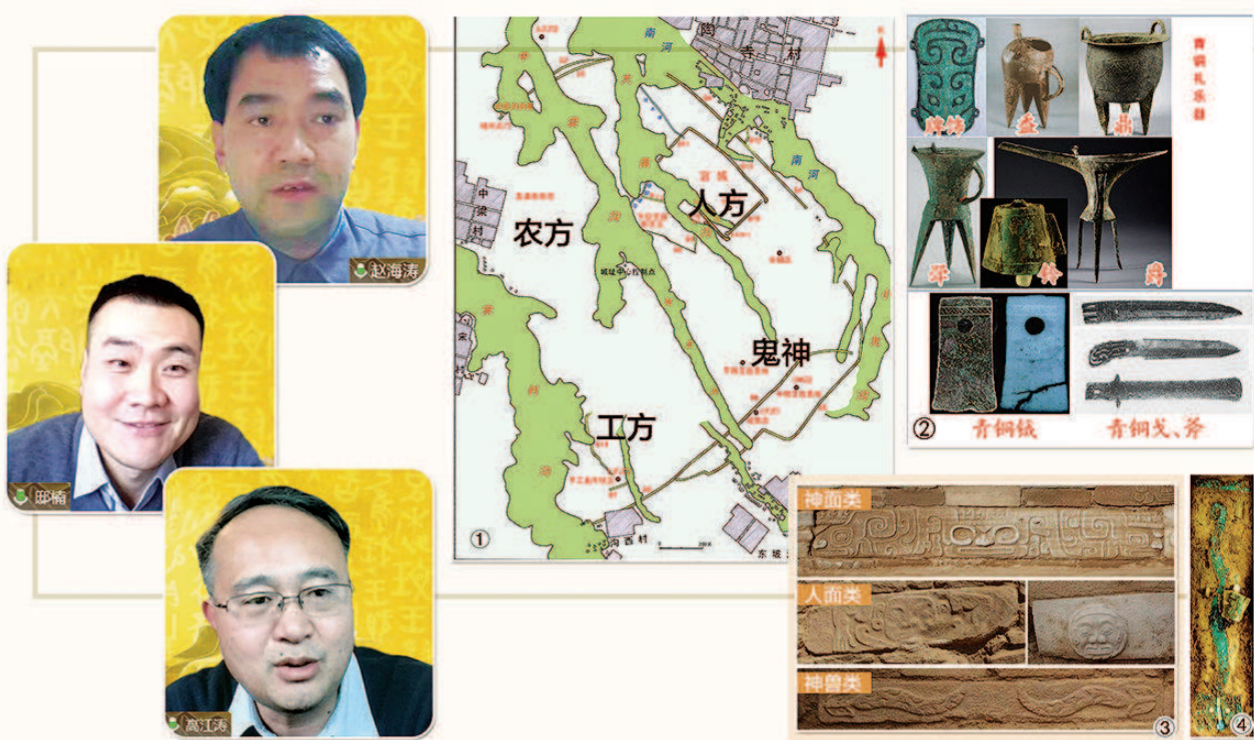
因此，距今4300多年前，先民们在晋南都城陶寺里筑城建宫、敬授民时，以礼治国、合和万邦，呈现出一个早期国家的面貌，它成为黄河流域进入早期文明社会的最早实证。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重要标识和主要源头之一。今日中国，陶寺走来！

祭祀场所。东北角一个2200平方米的大坑，深度4-6米，在100多平方米内发现了超过6具的完整猪骨。在偃师商城官城北边祭祀区，也发现了数百具猪骨，因此用猪祭祀为偃师商城国家级的祭祀制度找到了源头。

在官殿区南边是官营作坊区，东侧和北侧有近2米宽的围墙。内有面积约2万平方米的铸铜作坊和超过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器加工坊。这两种作坊加工出来的产品也是当时最高等级的礼仪用品。这个绿松石器加工坊主要加工绿松石牌饰和管、珠。

铸铜作坊里发现多种与铸铜有关的遗物，其中一块陶范虽残留较小，但可看出它是铸造口径直径30厘米、表面有花纹的青铜鼎的外范。二里头尚未发现这么大的有这种花纹的青铜器，说明现有的青铜器和墓葬不代表二里头的最高等级，更高等级的青铜器和墓葬尚有待发现。

二里头目前发现的青铜礼器有16件铜爵、2件铜盃、1件铜鼎、2件铜罍、7件铜铃等，表现出一定的青铜礼乐制度；还有少量的青



1月7日下午，159期文汇讲堂“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系列跨年四讲成功收官，159-4期《4000年前，中国王国与王朝的谜与底》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石峁考古队副队长邱楠做线上主讲并与听众互动。澎湃新闻提供媒体特别支持。

图①为陶寺城内有序布局，如《周易·系辞上》所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人方为高级居住区，农方为普通住宅区，鬼神为墓葬区，工方为手工作坊区。图②为二里头的青铜礼器已形成。图③为石峁发现的石雕，下方的神兽类为龙形，或是图④中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的源头。



提问请扫二维码  
整理：李念 杨新茹  
版式：李洁

## 邱楠：石峁，巨变中形成陕北高原早期国家

依据“区系类型”和“重瓣花朵”理论，石峁所在河套区域在距今五千至四千年前已经形成一个拥有独立起源及完善发展体系的文化区。

文化上的陕北地区主要包括榆林和延安的北部，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从仰韶晚期(BC3000-BC2500年)和龙山早期(BC2500-BC2300年)近800年的历史变迁中，社会逐渐出现复杂化的趋势，到了龙山时代晚期(BC2300-BC2000年)变化更加剧烈。

### 众星捧月，史前最大石城横空出世

以石峁遗址所在的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流域为例，一百余处龙山时代遗址按面积可分为三个等级——10万平方米以下、10-100万平方米之间、超过100万平方米。已经形成了“众星捧月”的空间布局和类似于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石峁已成为了区域中心。

石峁出现了环套结构的多重石砌城垣。城址总面积超过了400万平方米，是目前已知的东亚地区面积最大的一座史前城址。核心区称为皇城台，为宫殿区所在，面积8万平方米。内城把皇城台包裹其中，面积约210万平方米，整个城墙完全闭合，长度约6公里。外城是在内城东南方向延伸出去的一道城墙，也呈东西向的横向长方形，城墙西端利用了秃尾河河谷的断崖天堑，城墙并不闭合，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城墙长度约4公里。内、外城的城墙，现部分仍矗立于地表。

### 瓮城、马面：最早的同类城防设施

皇城台除了门址外，四周包砌有阶梯状的护坡石墙，石墙从山崩下的沟底开始修筑，高差最大处达到了70米，自下而上层层内

收，鳞次栉比，类似玛雅的金字塔，一则防止山体滑坡，二则统治者追求绝对的安全。

外城东门及周围墙体上附有瓮城和马面等遗迹，系国内确认的时代最早同类城防设施。东门主体建筑为两座高大的墩台，墩台之间是进出的门道。门道内外两侧修建有两道石墙，即为外瓮城和内瓮城。过去认为瓮城于汉唐时期出现，到了宋代，内、外瓮城才成为制度。与后期瓮城的形态相比，石峁的内、外瓮城形制还比较原始，但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功能。

另一重要的城防设施是马面，是城墙上凸出的方型墩台，和城墙互为利用，能够消除城下的死角，利于防守者自上而下从三面反击攻城的人。马面呈等距分布，距离和当时弓箭的射程有关，石峁发现的马面形制已经非常成熟，将马面历史从战国向前追溯了一千多年。

### 杀戮祭祀与藏玉于墙，宗教复杂化

龙山时代晚期，宗教祭祀形式复杂多样，可能已成为凝聚周围聚落的手段。在石峁外城东门的发掘中，发现有六处埋有人头骨的祭祀坑，应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或祭祀活动有关。最大的K2坑内发现有24具年轻女性的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和创伤。商代甲骨文曾记载有“斩人牲首”的方式。用人头进行奠基活动，可能为居住者提供精神上的安全保障。

石峁还发现有“藏玉于墙”的特殊现象。在外城东门的发掘中，在城墙的墙体以及墙基处，发现埋藏有玉器，应在城墙修建过程中有意嵌入的。这可能与《竹书纪年》中记载夏桀“作琼室、立玉门”相关。在皇城台的发掘中，在门址、大台基等重要建筑处也多次发

现玉器，有牙璧、玉钺和牙璋。先民在建筑中放置玉器，可能为驱鬼辟邪，获得精神的保障。

在皇城台发掘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动物骨骼和大量的骨器。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骨针，约有17000多枚，针孔甚至小到只能穿过头发丝，暗示着皇城台顶上居住有一些掌握核心技术的工匠，可能是被贵族阶层所控制。还发现了成语“巧舌如簧”所说的骨制“口簧”，可能是巫觋阶层进行宗教仪式所使用的道具。

### 宫墙石雕精美，龙形或传至二里头

在皇城台顶部发掘出一座大型的建筑台基，可能为当时的官室。在长达130米长的南护墙上发现有70余件精美的石雕，刷新了我们对早期艺术的认知和文明高度的预判。石雕的内容可分神面、人面、动物、神兽等几类。神面石雕普遍体量较大，造型夸张，多采用对称构图，中间为一张完整的正脸，两边是侧脸的形象。人面的比较写实，有的甚至表现出胡须等细节特征，人面的出现或许代表先民自我意识的觉醒。神兽可见有早期龙的形象，和二里头发现的绿松石龙非常相似。

另外，石峁遗址内房屋主要有地面式、带护墙的窑洞和土窑洞三类，不同结构的房屋分布区域不同，之间可能代表着一定的等级关系。墓葬规模的巨大差异显示了死者生前的身份地位和占有社会资源的差异。

以上考古发现清晰地反映出陕北地区在龙山晚期出现的社会变化，财富高度集中的过程中，聚落等级分化趋势逐渐明显，对防御需求越来越强烈，宗教祭祀已成为凝聚人群的重要手段，社会阶层和权力的分化，最终形成了早期国家。

## 赵海涛：二里头开创广域王国模式并引领后世

区。官城、宫室制度被商周等很多朝代所继承发展，一直到明清紫禁城达到顶峰，体现了二里头对后世文明进程的引领作用。

官殿区里有最早的多进院落官室建筑群，有证据证明这些官室建筑和墓葬都是居葬合一。二里头早期最高等级的墓葬目前也是发现于官殿区。

其中一座墓里出土有绿松石龙，它是早期龙形象里体量最大、制作最精美的一件：长度近70厘米左右，有2000多片绿松石嵌片拼制而成，设计和加工水平都非常高超，看起来活灵活现，栩栩如生。龙的形象很可能来自石峁，也被后世的青铜器所继承；殷墟时期一些青铜盘里的盘龙，可能是陶寺与其结合的蜷曲的一条龙。《诗经》记载周王祭祀周庙时“龙旗阳阳，和铃央央”，龙、铃共同出现，或是起到共同引导灵魂、神灵来往天地之间的作用。龙与铜铃共同出现最早是在二里头，有7例。

官营作坊，青铜礼乐形成

官殿区的北边区域发现有国家级的

铜工具和武器，另有玉刀、玉钺、玉戈、玉璧、玉戚、玉牙璋等6类玉制兵器，体现出二里头时期比较重视军权。

綜上看，二里头已经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有高度发达的文明程度，具有史无前例的一些创造，很多是石峁和陶寺所没有的，显示出王朝气象。

### 影响商周，辐射至越南北部

二里头地处中原，各地人群都逐鹿中原激烈竞争。在本地文化基础上兼收并蓄，最后出现了成熟的二里头文明形态。二里头开创了大范围广域王权国家超级核心统治四方的模式，打破了龙山时代没有超越地域单元的大范围中心的分布模式，并且被后世所继承。

二里头国家出现之后，城市规划、官城宫室制度、丧葬礼仪制度、青铜容器基本的种类和铸造技术及

背后所体现出来的青铜礼乐制度，都被商周所继承，并开启了青铜时代。牙璋、玉戈等玉器和陶爵、大口尊等多数陶器也被商代继承。

除了对中原主体文明的影响，二里头对周边文化也有很多影响。在东北的赤峰地区、江浙一带、四川三星堆，都能见到不同种类的二里头典型器物。二里头的牙璋有可能继承石峁或海岱地区，虽不是最早但有重大变化：大型化、龙型化、礼器化，向南影响了湖北、湖南、广东、福建、香港，顺着长江到了三星堆，甚至到了越南的北部。说明先进文化被当地接受并改变了当地的文明进程。这些充分体现出二里头在大范围的引领作用。

总体来看，二里头王国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出现了划时代的转折，由之前的无中心的多元进入到一体化、有中心的王国时代。它的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创造，为后来的商周文明奠定了最主要、最直接的基础，并且和商周文明一起创立了华夏礼乐文明的基本特征，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